

对话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得主班宇

今天的很多现实,只有用今天的语言才讲得清楚

前沿观潮

发现那个点闪着光
引领你走向另一条故事的通道

记者:今年七月,你的短篇小说《漫长的季节》获得了鲁迅文学奖。你最初是怎么构思这个故事的?

班宇:小说很多时候都是从记忆里摘取一个点,然后在今天回望记忆里那个点的时候,你发现那个点闪着光,引领你走向另一条故事的通道。

对我来说,这篇小说里面记忆的那个点,就是小的时候在报纸上看见的,我所在的城市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冰装节,向市民征集冰装设计方案。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,由此我想到,参与投稿的人中,一定有很多人,对美、对生活怀有深切的渴望与向往。

于是我想,如果一个女孩要设计出一套方案,她或许有着许多想法与热情,却未必能独立完成,仍需依靠家人、亲戚或朋友。这便成为我创作这篇小说的起点。我始终觉得,一家人为一个不知能否归属于自己的奖项、荣誉共同努力,这件事本身便格外温暖,它是家庭之爱最明显,也最温柔的一种呈现。

因此,我写这篇小说的出发点,是想书写这种向往的状态——在这样一件小事里,一家人也好,朋友之间也好,重新凝结为一个温暖的小团体。小说固然常常是现实的、残酷的,要书写艰难的处境,但总会有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,让作者与读者都感到幸福。

记者:你说这个故事是“每一个普通人不可避免的人生困境”,怎么从一个特殊的故事中提炼出这种普遍性?怎么让读者产生共鸣?

班宇: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。《漫长的季节》其实讲的就是缓慢地接近死亡的过程。我相信但凡一个成年人,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,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经验。

写作时,我并未想过如何让读者产生共鸣。小说还是在某个细节上先让作者自己信服,而之后其他人是否相信,在那一刻或许并不重要,而且作者也无法完全把握读者的想法。所有创作都是如此,写一首歌、画一幅画,概莫能外。

任何一种创作都值得提倡
所有人都有全新的、多面的精神面向

记者:现在“新大众文艺”是个热词。你怎么看“新大众文艺”?当外卖员、快递小哥都在用短视频和文字讲自己的故事时,专业作家和非专业写作者的区别在哪?

班宇: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。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、身份如何,比如医生、外卖员、警察、教师等,都可以进行自我的表达与创作,创作的形式既包括短视频、照片,也包括文学作品。新大众文艺呼吁人拥有多重身份与新的精神世界:不是说一个人是医生,便能固守于手术台,私下里他同样可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、读小说的人,或是一个喜欢弹吉他、唱歌的人。文艺不再是“歌星唱什么,我来听什么”,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生活的创作者。在我看来,这种创作与表达或许正是新大众文艺的内核——它呼吁所有人拥有全新的、多面的精神面向。

写作这件事,很难说有什么特别强的专业性。只要有笔、有纸或是一台电脑,人人都可以进行自己的叙述。今天人们所接纳的事物、所依赖的审美系统各不相同。有些人喜欢谈美

文、读网络文学,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消遣;也有人希望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内心与世界,不愿止于消遣,希望在作品中寻找到与自己类似的困惑,因而去读严肃文学。因此我认为,任何一种创作都值得提倡。无论对创作者还是接受者而言,这都可能是良好的沟通过程,而整个社会当下最需要的,正是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沟通。

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,专业作家最要紧的一件事,就是不断更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,更新自己的语言。今天的很多现实,只有用今天的语言才能讲得清楚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催生了那么多新概念、新语汇,怎么从里面找到线索,把此刻的故事讲出来,是所有写作者都面对的问题。只有保持学习的姿势,与世界发生联系,不断去感受新东西、坚持写下去,才有可能真正贴近这个时代的核心。

文学没有必要去跟短视频“掰手腕”
每个人都是在创作中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

记者:你提到“哪一种创作都是值得提倡的”。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词“纯过日子人”,说的是有深度的电影不看了,严肃文学也不看了,就爱刷短视频、看点短剧。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
班宇: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。短剧、短视频跟严肃文学或者电影是有区别的,但它能吸引那么多观众,一定是有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剪辑节奏的,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新变化。

面对这种变化,我觉得文学没有必要去跟短视频“掰手腕”,也不是要站在它的对立面。新大众文艺呼吁的是人人都去创作,你一旦创作起来,哪怕只是成为一个短视频创作者,你就会发现,自己还是有输出和表达的倾向,依然有审美蕴含其中。当然也会有人为追逐流量而创作,但也有很认真做内容的博主,那也是一种新大众文艺的创作。所以文学和短视频并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,每个人都是在创作中寻找自己表达的方式。

至于“纯过日子人”,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这样说,是不想再靠标签来武装自己。之前我们聊天,说喜欢哪个导演,我说喜欢小津安二郎,喜欢黑泽明,好像要靠这些大师来证明自己的审美和品位。但实际上,有的人审美上确实不喜欢那个东西,就是喜欢看短剧,他反而更坦然一点面对这个世界;还有一部分人,他是真的喜欢黑泽明这些导演的片子,我觉得他也不必羞于开口,可以完全把自己的喜好袒露出来。

所以我觉得“纯过日子人”说的不是放弃深度,而是说我们去面对自己,干自己喜欢的事,把精力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,不必用别人的眼光来评判自己。我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,让自己过得舒坦、心情愉悦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换言之,那些标签并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东西,除了负担之外。

AI始终是一种更中庸、更平庸的输出
因为它要照顾多数人的审美

记者:AI写作会让你产生危机感吗?从你的技术背景和写作经验来看,你觉得AI能写出像《漫长的季节》这样的故事吗?

班宇:没有太强烈的危机感。我现在用AI,或者说我观察到别人的使用,基本上都是把它当作搜索引擎或者整理工具。至于用AI

进行创作,我身边还很少听说有这样的情况。

我学计算机那个时代离现在将近20年了,跟现在的AI完全搭不上边,所以我对AI也不算了解。但是我看现在的语言模型以及数据分析,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出《漫长的季节》,不过如果算力足够、有人能够参与的话,要让它们写出一个不错的故事,应该也是有可能的。

可我觉得AI始终是一种更中庸、更平庸的输出,因为它要照顾多数人的审美。但是每个创作者其实是不抵的,他的审美、感知、趣味都不同,他努力想去抵达的读者有可能就是那么一小群人。AI就是一个调停者,调停人和世界之间的输出——你给我一个指令,我输出一个更多的人能理解、能接受的东西,但是有可能你的审美更好,你就觉得它不行。但它不在意,因为它只是输出一个平均值而已。

文学的价值就是让信息多一点
让读者通过作品去想象另一种生活

记者:在数字时代,文学需要建立“连接”吗?

班宇:文学始终在致力于建设连接。今天,人们活得越来越相似。不同城市的建筑、车站、连锁餐饮店看上去都差不多,人的情感模式、生活方式与经验也在同质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小说还能把人重新连接起来,这件事越来越难做,却也越来越重要。

每个作者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里,面对着所有的时代诉说。所以你读一个作品,就是站在他那个时代里去感受他的生活。我觉得这种连接既不需要面对面,也不需要谁说服谁。它是在你读到作品里的某个细节、发现自己“也经历过”的那个瞬间发生的,让你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,甚至不同时代的人,有了相似的感受。

记者:在算法推荐、大数据机制下,互联网会给你推送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。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“信息茧房”里。文学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什么价值?

班宇:文学的价值就是让信息多一点,让读者能更多地通过作品去想象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生活,而不仅仅是被困在网络给你制造的“信息茧房”里面。

文学给人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时间感,不像在手机上那样一晃而过。当你沉下心来阅读、去思考时,就能从碎片化的信息世界里暂时走出来,重新感受时间的长度、思想的深度,以及生活里那些细碎的、容易被忽略的东西。

今天,人们经常担心短视频这类碎片化内容会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,因为人只是在被动接收。但我认为,创作本身也是一种抵抗。新大众文艺呼吁人人都去创作,你一旦开始创作,哪怕只是拍一拍短视频,也会发现自己仍然在主动输出。文学同样如此,它提供的不是一条被动接收的通道,而是一个让你停下来、自行发生反应的时刻。

记者:你把写作视为一种“具体行动”。如何理解这种“行动”?写作能为一些陷入精神内耗的年轻人提供什么?

班宇:这或许因人而异,每个人只有亲自去做才能知道。有人通过拍短视频、剪视频来缓解精神内耗,有人则通过运动来消解压力,这取决于个体情况。

但我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:嘴上说着想躺平的人可能也不甘心完全躺平,不如去行动起来,做一些让自己更满足的事情。写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“释放”,但它是一种具体行动。

所有的困惑可能就是需要写下去——坐在书桌前把文档打开,一个字敲下去,反复比对、一点点修改。写作是要投入情感、投入劳动的过程,你跟一个角色、一段故事相处一段时间,到了要告别的时候,会有一点不舍。这也是它和纯粹的情绪宣泄不一样的地方:它把那些说不清的东西,变成了一个具体的、可以反复打磨的对象。

无论是东北还是武汉的故事
人与人之间短兵相接的感受都是相似的

记者:你从东北来到武汉,从工厂到码头,这种地域转换会带来什么新的感受?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市民生活,你写的是东北的工厂记忆,这两种写作之间有没有相通的东西?

班宇:从东北到武汉,来到一个新的城市、一个新的地域,各种新的文化向我涌来,包括码头文化、长江文明等等。武汉本身在近代史上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,所以它的历史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刺激。东北有工业记忆,湖北有楚文化。凡是与写作者相关的一切,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滋养,只是提供的养分不同,因而会长成形态各异的作品。但这样的历史源流,永远是写作的重要根系。

早些年我读过池莉的小说,对武汉的市井烟火气印象深刻。无论是东北还是武汉的故事,书写的都是市民生活,其中那种热情、热烈的东西,那种人与人之间短兵相接的感受,都是相似的。我笔下的东北或许没有那么热烈,反而是阴郁、冷峻的。童年时看东北的工厂,觉得它们像一个个钢铁巨兽。那些庞大的机器、油罐都有几层楼高,钢铁制成的东西不像砖房那样有人气,你会觉得它特别冷。那种冷峻感或许也渗透了我的文字。但人与人的关系,我觉得依然是热情的。就像前面所说,虽然城市气质不同,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相通的。

我的写作从未固守某个地域,《漫长的季节》便虚化了具体时空,没有明确的时间,没有明确的地理环境。东北的元素在我的作品里越来越少,其实也不是我有意为之,而是每篇小说想写的事不一样,这取决于故事本身。但当我从一个地域游历到另一个地域时,视野变得更加开阔,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小说面貌出现。

记者:你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里说,写作者“面对着沉默的空气,面对着无声的记忆”。从东北到武汉,你面对的“记忆”换了一批,一个作家要怎么真正“听见”一个地方的记忆?

班宇:还是去感受,去走那些大街小巷,然后去跟人们对话,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,包括过去和现在的。武汉的江汉路、山海关路等,我都去过。我觉得山海关路的烟火气特别足,每天早上都有好多人在排队,我常去那边。一个城市的生命力都在这烟火气里。我也会去尝当地的食物,热干面我觉得还可以,就是东北那边吃咸豆花,武汉这边是甜的,有点吃不惯。这些饮食的细节若是写进书里,就不用刻意去设计。你熟悉它、了解它,写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

之前有记者问过我对武汉的印象,我说武汉是一个特别立体的城市。一方面,市民生活、爽利性格,构成了鲜活的城市面貌;另一方面,有很多跌宕起伏的历史藏在城市的褶皱之间。每次走在武汉的街上,就感觉每一条街巷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这样的城市,值得被更多次书写。

(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见习记者 谭佩)

当算法越来越“懂人”,如何守住认知安全

□ 胡宗山 郭慕琳

意识形态关乎旗帜、关乎道路、关乎国家政治安全。进入智能化时代,当算法越来越“懂人”,信息影响的已不只是人们看到什么,也在悄然影响人们怎样认识社会、理解国家、评价制度。人们的认知与意识形态安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,守住认知安全,就是守护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根基,让主流价值始终拥有坚实的思想支撑。

认知安全看似发生在人的头脑中
实际上联结着社会共识与国家安全

认知安全即防范个体及群体认知过程遭受恶意操纵、误导或破坏,进而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种状态。在笔者看来,认知安全也是人们认识现实、辨别是非、形成判断的安全。一个社会怎样看待自身发展、理解现实问题、认识国家制度,关系到国家认同的形成,也关系到社会能否凝聚共识、保持稳定,因而是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重要基础。

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算法推荐等的快速发展,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、传播和接受方式。过去的信息竞争关注的是“让人看到了什么”,而今天的认知竞争则着眼于“人们怎样理解所看到的东西”。同一个社会热点,突出哪些事实、怎样解释事实、向不同群体推送何种内容,都可能影响人们最终形成的判断。信息传播由此不再只是简单的内容传递,而是越来越深入到人们认识现实、解释现实的过程中。

这种变化首先源于智能技术的发展。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的生产更加便捷,

大数据能够分析不同群体的兴趣和关注点,算法推荐又会根据点击、停留、转发等行为持续推送相关内容。三者相结合,一条信息可以快速找到其特定受众,一种观点也可以在反复出现中不断加强强化。过去相对粗放的信息传播,正在变得更加精准、持续和个性化。

技术本身并无优劣之分。只是当其被用于选择性地呈现事实、放大特定情绪、固化单一解释时,人们看到的世界将越来越片面。久而久之,受影响的也将对一时一事的看法,深入到对社会现实、国家制度与主流价值的整体性认知。

筑牢认知安全防线,已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内容。认知安全看似发生在人的头脑中,实际上联结着社会共识与国家安全。当前,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、表达意见、观察社会的重要窗口,尤其对年轻人来说,很多信息观点及背后的社会认识首先来自手机屏幕。因而,既要关注网上传播了什么,也要关注这些信息经过长期积累后,会让人形成怎样的认知。

既看信息真假,也看传播方式
既看一时热度,也看长期影响

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交流交锋的重要阵地。在此过程中,出现不同声音实属正常。讨论社会问题,提出建议,本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。真正需要警惕的,是一些复杂问题在传播中被恶意剪裁,个别现象被说成普遍现象,情绪判断代替事实判断,使人们形成完全失真的认识。智能技术越发达,这种影响越可能以更加日常、更不易察觉的方式发生。

社会热点一旦进入网络,最易发生的就是复杂问题被简单化、标签化。因而,我们要警惕网

络舆论主导权、议题解释权的竞争。就业、婚恋、教育、公共治理等问题,本就有其复杂成因。但网络传播往往只挑选最易引发情绪的部分,反复突出矛盾的一面,把复杂原因压缩为单一结论,再通过一句标签、一个片段迅速传播。长此以往,个别人的经历就可能被当成所有人的经历,具体问题也就可能被无限放大为普遍问题。届时,人们关注的可能不再是“事实到底如何”,而是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心态理解社会问题。相比一眼就能识别的谣言,这种“以局部代替整体”的方式更隐蔽,也更考验治理能力。

算法流量的叠加,又会使这种偏差进一步累积。当下,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。算法根据个人喜好不断推荐相似内容,本是为了提高信息获取效率,但也可能让人长期停留在相似的观点中。越是愤怒、猎奇、对立的内容,越容易吸引点击和讨论。即使信息本身并非完全虚假,但对局部事实的不断拼接截取与极端化内容的放大效应,会使人对现实图景陷入不完整的虚幻认知。

今天的网络表达还有一个变化:许多观念并不以严肃说教的面目出现,而是藏在段子、热梗及日常聊天中。它们轻松、简短、易传播,也更容易进入年轻人的生活。如果主流声音总是慢半拍,表达方式又离现实生活较远,一些看似“解气”的极端说法就可能抢先占据人们的注意力。久而久之,影响的不只是某一热点的舆论走向,还可能年轻人看待奋斗、责任、家庭、社会和国家的积极态度。

具体问题被不断拔高和泛化同样值得警惕。现实生活中出现矛盾并不可怕,关键是实事求是看问题、解决问题。但在网络传播中,有时一件事没有处理好,就被说成所有事都处理不

好。某一地方、某一环节的问题,被推成对整体治理的判断。长此以往,就容易把对具体事情的不满变成对社会运行的笼统否定,增加沟通成本和信任成本。

智能化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,不能只盯着真假信息,也不能只在热点出现后忙着“灭火”,更重要的是及时看见情绪从哪里来、观点为何迅速扩散、具体问题如何被歪曲。把这些变化看清楚,才能在问题还未积累放大前及时回应、有效引导。

做好认知安全工作,不能靠简单删帖,也不能等舆情发酵后再行应对。而要把工作往前做,既看信息真假,也看传播方式,既看一时热度,也看长期影响,及时发现那些可能把正常分歧推向情绪对立的苗头。

既要管好信息传播
更要把道理讲清、把问题解决好

维护认知安全,既要管好信息传播,更要把道理讲清、把问题解决好。面对智能传播的新变化,应把工作做得更主动、更细致,让真实、理性、有说服力的声音更快到达人群,让群众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形成正确判断。

主流声音要更具解释现实的能力。面对社会热点,及时发声很重要,把事情讲明白更重要。不能只告诉大家“应该怎么看”,还要把事实经过、现实背景、政策依据讲清楚,主动回应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。特别是就业、教育、婚恋、社会公平等关注度高的议题,更要少一些生硬说教,多一些事实生活,少一些空泛表态,多一些有针对性的解释。群众的疑问得到正面回应,片面和极端的看法自然就少了生长空间。

要主动做强优质网络内容。今天的青年习惯在社交平台中获取信息,主流价值传播也要主动走进去。既要发挥权威媒体作用,也要鼓励更多懂网络、懂青年、懂生活的创作者参与进来,用年轻人愿意听、听得懂的方式讲道理。好的传播,不是把概念说得多么高深,而是能不能回答现实问题、回应真实关切。让有价值的内容既“说得对”,又“传得开”,才能真正形成影响力。

平台和算法需守好传播关口。平台不能只在违规内容出现后处置,还要看到推荐机制可能带来的放大效应。对网络谣言、极端化内容、异常热点传播等情况,要提高发现和研判能力。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、跨平台快速传播等新情况,也要及时完善识别办法。算法可以把情绪推高,也可以把真实、理性、有用的信息送到更多人面前,关键在于把社会责任更好地嵌入技术运行之中。

更深一层的防线,在于人的判断能力。面对海量信息,如何分清事实与观点、情绪与道理,本身就是一道重要防线。因而,要将青年认知能力建设做在平时。结合青年学习生活的实际,加强数字素养、媒介素养和国家安全教育,引导青年多看事实、多作比较、多问几个“为什么”。同时也要看到,很多网络情绪背后都有现实关切。只有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,把实际问题办好,才能让正面引导更具底气、更有说服力。

认知安全不是让网络上只有一种声音,而是让事实不被情绪遮蔽,让不同意见能在理性基础上交流,让共同价值在真实生活中得到认同。智能技术越发展,我们越要守住人的判断力、社会的凝聚力 and 主流价值的引领力,让技术进步真正成为增进社会信任、维护国家安全的助力。

(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、博士生)